雨過天晴乎：日中關係新發展

何思慎*

2018 年 4 月 16 日，中國大陸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藉出席「日中高層級經濟對話」，對日本進行睽違近 9 年的官式訪問，此有別於 2016 年 8 月為出席「日中韓外長會談」的日本行。王毅訪日乃日中關係升溫的重要指標。在日、中外長會談中，河野一郎外相指出，在《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40 周年之際，希望重新構築符合「和平友好」之名的關係。為此，日、中同意為求東海的穩定，儘速達成「海空聯絡機制」協議，避免偶發性衝突危及兩國關係。日、中部長級對話重開及王毅訪日亦為兩國重啟「首腦外交」舖路，促成中國大陸總理李克強藉出席「日中韓峰會」，實現任內以官方身份首訪日本。

本文將分析促成日本與中國大陸修好之原因與經過，並評估未來日中關係走向及其對臺日關係之意義。

川普捨 TPP 安倍轉身「帶路」

在高舉「新孤立主義」、「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的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表態不支持《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 TPP）的現實

* 作者為天主教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兼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doi: 10.30382/SSA.201806_(150).0001

下，安倍晉三首相一改過去抵制「一帶一路」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 AIIB）的態度。2017 年 6 月 5 日，在「亞洲的未來」國際交流會議上，表態願意思考與中國大陸共建連結東亞與歐洲間的經濟帶，使日本不缺席歐亞大陸的政經秩序重構，避免自身遭邊緣化。

冷戰結束後，日本曾想像國際秩序由美、蘇兩極對立蛻變為美、日、歐三極共管，[1] 但伴隨著「全球化」，日本經濟失去冷戰時期的活力，至今仍難脫結構性的衰退。其間，中國大陸的崛起，至使日本無法擺脫「美日同盟」，展開「自立外交」，在安全上須依賴美國的日本，在外交上對美國保持亦步亦趨。為與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的「再平衡」（Re-balance）戰略相向而行，安倍首相對「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抱持觀望，甚至藉「積極和平主義」與「俯瞰地球儀外交」外交的開展，構築「對中包圍網」，試圖遲滯習近平「一帶一路」的發展。[2]

隨著川普總統上台，「再平衡」時過境遷。以創造美國就業，再現強大美國的川普政府雖在平衡美中貿易上施壓中國大陸，但對「一帶一路」並非採取一味抵制。美國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現身「一帶一路高峰會」可證川普對中政策的務實態度。美國企業參與「一帶

[1] 栗山尚一，〈激動の 90 年代と日本外交の新展開—新しい国際秩序構築への積極的貢献のために〉，《外交フォーラム》，3 巻 5 号，1995 年 5 月，頁 16。

[2] 〈日本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曲解與選擇〉，《人民網》，2017 年 1 月 19 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BIG5/n1/2017/0719/c1003-29413541.html>。

一路」可為美、中創造雙贏，亦使日本投入「一帶一路」及「亞投行」不再受到美國的牽制。其實，「安倍經濟學」（Abenomics）的第三支箭須借東風，以外力打通日本經濟結構改革的任督二脈。

在全球化經貿秩序的形成中，為避免日本失去先機，安倍首相改弦更張，與中國大陸協調的策略應可預見。2017 年 5 月 17 日，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接受《每日新聞》訪問時不諱言透露，日本應參與「亞投行」的積極想法，並展望日中關係，認為雙方簽署新公報的時機儼然成熟。2017 年 12 月 28 日，二階幹事長偕同公明黨幹事長井上義久率團再訪北京，出席「日中執政黨交流機制第七次會議」。此行二階及井上拜會習近平，會談中二階呼籲實現日、中首腦互訪，提議構築「貢獻世界和平與繁榮的新時代日中關係」。

「在商言商」日本視個案參與「帶路」

對於當前日中關係，日本認為，追求「強國」，致力「脫貧」的中國大陸在經濟上需要日本，而「十九大」後權力穩固的習近平，亦無須以「反日」的民族大義，強化統治的「合法性」，對應日中關係，習近平將趨於務實理性，放大膽彈性處理日、中諸多爭端。此外，若能成功吸引處於對立的日本加入「一帶一路」，不僅對內彰顯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的凝聚力，亦可爭取中國大陸民眾支持推進日中關係。

日本政府之經濟產業省與商界多認為對中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兩者應分別處理。尤其是對「一帶一路」，雖然可確認是中國大陸擴張影響力之藍圖，但日本學界對它的本質尚無共識。彼等或認為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畫大餅、或者只是

將江、胡時期即有的「西部開發」、「中部崛起」等規劃串連之舉。目前，日本應「個案評估」，有選擇地參加。

此外，在日、中面對川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感到壓力之際，繼 2010 年，睽違 8 年「日中高層經濟對話」恢復舉行格外令人注目。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世耕弘成與中國大陸商務部長鍾山就美、中貿易摩擦升高之情勢下，維持及強化以世貿組織（WTO）為架構的多邊貿易體制達成共識。面對川普高揚貿易保護主義，日、中一致認為掀起貿易戰將對國際經濟的繁榮造成負面影響。鍾山直言，經貿合作將成為日中關係的「推進器」。

因此，日中關係將技術性改善，走出「釣魚臺國有化」的陰霾。此外，身為「亞洲的一員」的日本，日中關係為戰後日本除美日關係外，最為重要之對外關係，日本須致力於與中國大陸交往。在全球化經貿秩序的形成中，為避免失去先機，日本改弦更張，與中國大陸協調的策略應可預見，且在「一帶一路」基礎建設個案中，尋求雙方合則兩利的機會。誠然，安保上，日本難以離開美國，一改戰後至今的「親美」路線，但安倍無法苟同川普「美國第一」下之保護主義的立場顯而易見。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日本將與力主推進「全球下」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中國大陸相互取暖。

2018 安倍致力重啟日、中高層互訪

日本學界評估 2018 年日中關係認為，當前美、日、中三方情勢，以川普造成之不確定性最大。由於川普政府內受國會與民主黨掣肘，對俄政策與對中東政策仍具不確定性，且北韓核武問題僅能擺出強硬姿態但欠缺具體對策，目前對北

京態度較為溫和。日方有鑒於此，亦需同步改善日中關係。2018 年 1 月 27 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任內首度訪中，與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舉行會談，力爭早日舉行由日本擔任輪值國的「日中韓峰會」，並促動安倍首相與習近平互訪，使日中關係在《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簽訂 40 週年之際，回復正常。王毅指出，中國大陸重視日本近期在對中關係上所作積極表態，特別是注意到安倍首相在國會演說中將改善對中關係作為下步重要施政課題。

2018 年 5 月 9 日，「日中韓峰會」在日本召開成為重啟日、中首腦外交之契機。因此，日、中雖存在難解的歷史認識問題及東亞的海域爭端，但「政經分離」的日中關係不必然因政治歧見阻卻雙方經濟上的互利合作。安倍深諳在歐、美企業相繼投入「一帶一路」的現實下，一味抵制不僅徒損日本經濟利益，更恐招至日本企業在「全球化」佈局中，先機盡失，淪為邊緣。再者，長期執政的安倍首相若遲遲未實現其再任首相後的日、中「首腦外交」，將遭到「俯瞰地球儀外交」無法有效處理日中關係的質疑。誠如官房長官菅義偉言及安倍任期超越小泉純一郎首相一事，指出「最重要不是任期有多長，而是任內有何作為」，意在史上留名，追求歷史功績的安倍首相須在日中關係上建新猷，展現對中交往的能力，確保日本國家利益。

安倍首相在對中外交中，審時度勢，軟硬兼施，以爭取變局中之主動，將為 2018 年《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40 週年時，實現雙方領袖互訪，營造良好互動氣氛，延續該條約締結 20 週年及 30 週年時，皆見「首腦外交」登場的傳統。2017 年 10 月 22 日，日本眾議院大選，輕騎過關的安倍已邁向日本史上任期最長首相，全力實現修憲的「悲願」，而

「十九大」後的習近平亦將放手一搏，一圓「強國夢」，但日、中不會因之重回20世紀的衝突老路，而將在全球化的浪頭上，探索合則兩利的可能途徑。2018年雙方是否延續《日中友好和平條約》簽訂20、30年時的前例，發表日中關係「第五項文件」，重申或強化「臺灣問題」等涉及日中關係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為觀察指標。前外務次官藪中三十二指出，安倍首相的外交無疑在世界範圍顯示出存在感，接下來的課題是，在保持與美國及東協國家良好關係的同時，如何改善日中關係。

2017年10月11日，習近平在越南APEC的「習安會」中指出，日中關係的兩塊石頭，一個是歷史，一個是臺灣。「臺灣問題」恐成為「第五項文件」內容之一，而日、中未來在「一帶一路」的對接亦可能為「第五項文件」所聚焦的重點。2018年1月28日，中國大陸外交部於日、中外長會談後表示，日本對參與「一帶一路」表明積極態度。目前，日、中正醞釀在泰國開展日、中、泰「帶路合作項目」，此可望為2018年日、中首腦互訪的「伴手禮」。

朝核新局牽動安倍對美、中外交

在兩韓「文金會」後，金正恩爆破拆除豐溪里核試場，向世人展現「棄核」的誠意。之後，川普與金正恩的對話若能在「棄核」模式達成共識，應可順勢啟動美朝（北韓）關係正常化，困擾亞太安全已久的朝核危機將可和平落幕。誠然，打開美朝關係將為日本對朝外交去除美國的限制因素，使日朝關係正常化具備前提，但此並非日、朝和解的保證。存在於日、朝「綁架日人事件」的合理解決始為日、朝能否實現建

交的關鍵因素之一。

此外，在中、朝會談恢復，兩韓峰會重啟，「川金會」受高度期待之際，再三強調若北韓不端出具體棄核行動即堅決對其採取嚴厲制裁態度的日本，在朝核爭端中漸陷邊緣化的尷尬。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教授佐藤洋一郎接受「美國之音」（VOA）採訪時表示，日相安倍再會川普的目的不外乎是避免成為朝鮮核問題的「局外人」。

然而，美朝關係打開卻成為解決「綁架日人事件」千載難逢之機會，安倍首相雖趁中、韓、美三國首腦依次與金正恩會談之勢，拋出「安金會」的想法，但在「川金會」成敗未定之前，外交上追隨美國的日本只能等待，川普決不容許安倍先行。再者，安倍雖欲實現「安金會」，但外交上不能對北韓示弱，請求舉行會談，其策略便是透過川普施壓金正恩，迫使其與安倍進行首腦會談，並期藉此向金正恩傳達日本旨在解決「綁架日人事件」，使綁架受害者立即回國的想法，為日朝關係正常化奠基。安倍期待金正恩二度扮演安倍內閣的神救援，再造 2017 年 10 月，藉口「北韓飛彈危機」順勢解散眾議院，使安倍內閣復活之功。

其實，美朝關係發展中，安倍須嚴防川普犧牲日本利益。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言及朝核威脅時，一改過去將美國與盟國並陳的說法，僅要求北韓不得對美國構成威脅，此不啻為安保上「美國第一」展現。日本關切「川金會」中，美國是否對金正恩網開一面，同意北韓保留中、短程飛彈，此類飛彈雖不足以威脅美國，但卻足以攻擊日本。因此，安倍勢將在外交上，敦促川普須充分考慮盟國日本的安全利益，不能在北韓去核及中止飛彈發展上打折扣。

美、日間的不信任不僅在朝核危機解決，貿易爭端亦為

雙方齟齬的可能成因。安倍對美外交雖力求在「貿易爭端」及「安全同盟」間保持平衡，但「美日同盟」因「美國第一」下的貿易保護主義蒙上陰影則為不爭的事實。美國日本問題專家葛林（Michael Green）直言，日本擔心遭川普「出賣」。[3] 無獨有偶，日本民間智庫《日本國際論壇》（伊藤憲一任會長）發表美、日專家與前政府官員對〈安倍與川普時期之美日同盟〉的意見彙總報告，提及川普的「鋼鋁重稅」措施將使美、日關係蒙上一絲瓦解的徵兆。[4] 川普在朝核問題的解決，若未滿足日本的安全利益或無視安倍解決「綁架日人事件」之殷切期盼，不僅「美日同盟」將有失去政治支持之虞，支持率暴跌至 26.7%，遭媒體戲稱進入「危險水域」的安倍首相亦恐因「安倍外交」落空招致滅頂。在美日關係面臨挑戰之際，安倍挪移外交的腳步，重修日中關係。

日中關係走向及對臺日關係之意涵

此次，日本藉「日中韓峰會」迎來李克強總理任內首次的官式訪問，距前次溫家寶的訪日長達 7 年之久，此為日、中關係正常化以來之異例。因此，李克強此行的重點不在出席「日中韓峰會」，而為重啟因「釣魚臺國有化」中斷的「首腦外交」，此標誌日中關係回到正常狀態。李克強訪問日本前夕，

[3] 〈擔心成為「局外人」安倍訪美談朝核和貿易〉，《美國之音（VOA）》，2018 年 4 月 18 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abe-trump-20180417/4354026.html>。

[4] 〈日本民間智庫報告擔憂「同盟瓦解徵兆」〉，《共同社》，2018 年 4 月 13 日，<https://t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4/c7dc601a51b9.html >。

在日本《朝日新聞》發表題為《讓中日和平友好合作事業再起航》之文章，表示「希望通過此訪與日方一道重溫條約精神，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在日、中四個政治檔文件確立的原則基礎上，共同努力，相向而行，推動日中關係重返正常軌道，行穩致遠」。李克強抵東京時以「雨過天晴」形容當前的日中關係，而安倍在首腦會談後聯合記者會亦稱日中關係將「從競爭走向合作」。

此外，在川普「美國第一」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下，日、中、韓重申推進《日中韓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 FTA）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 RCEP），強調自由貿易對東亞繁榮的重要性，三方在藉多邊架構實現貿易自由化的立場與川普大異其趣，川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為日、中、韓三國須共同應對的挑戰。在日本經濟界舉辦的歡迎會，李克強表示，「中、日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針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傾向，有責任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維護世界經濟來之不易的向好局面」，[5] 呼籲中、日合作，打造「中日韓＋X」合作模式。中國大陸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的副所長宋均營表示，日、韓雖然在安全上與美國結為同盟，但在經濟上歷來融合於亞太地區、東亞合作進程當中，維護自由開放貿易體制與地區秩序，符合日、中、韓三方的共同利益。此意味日、中、韓在東亞自由貿易體制建構三方找到接點，日本一改不支持「一帶一路」的態度，與中國大陸達成推進在亞洲基礎

[5]〈李克強在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40 周年招待會上的演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8 年 5 月 11 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558512.shtml>。

設施建設領域的合作。日、中為此簽訂《關於中日協力廠商市場合作的備忘錄》，在安倍訪陸時召集首度的「官民協議會議」，探討展開合作的項目，具體形成「一帶一路」之合作。

李克強的「日本行」為 2018 年 11 月安倍首相正式訪問中國大陸及 2019 年 6 月習近平藉「G20 大阪峰會」首訪日本暖場，習近平可望成為德仁皇太子即位天皇後，首位在皇居接見的外國元首，將日中關係推向高峰。2018 年 5 月 15 日獲日本內閣會議通過的《外交藍皮書》對日中關係的評價較前積極，稱兩國關係「大幅升溫」，2016 年和 2017 年的表述則為「出現改善的趨勢」，此用語的差異反映日中關係前後的溫度差，相較於 2012 年前後的艱困時期，日中關係顯然走出谷底。[6]

總的來看，日本對中政策的基軸將從「制約」趨向「融和」，但其間如何緩解雙方的安全戰略博弈是為挑戰。對此，中國大陸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的教授周永生直言，歷史問題、領土紛爭等日、中間的矛盾確實未獲解決，但應效仿老一輩的做法，不使問題成為問題。中國大陸國際問題研究院的副院長阮宗澤更指東亞之大，完全容得下中國大陸與日本。換言之，在北京亦視日中關係改善為周邊外交所必要時，存在於日、中間的諸多懸案將掛起來。

政策建議

在無「九二共識」下，我國外交恐日益艱困，臺日關係亦

[6]《平成 30 年版外交青書（外交青書 2018）》，2018 年 5 月 15 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363740.pdf>。

復如此。囿於兩岸關係不睦，日中關係的改善將墊高臺日關係成本，我方切莫「一廂情願」的期待日本「視臺如己」，在兩岸的針鋒相對中，為臺灣挺身而出。因此，在日中關係回溫之際，臺灣若放任兩岸由冷和走向對抗，將難以極大化臺灣在美、日、中三者間的利益。此外，臺灣對「一帶一路」亦應在商言商，視個案檢討利弊得失，藉此尋求兩岸關係之可能接點。與日本相仿，在歐、美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的現實中，一味的採取抵制徒損自身國家利益，亦使臺灣企業在「全球化」競爭中，失去優勢，安倍內閣對「一帶一路」的務實態度，值得我方參考。

我政府應密切關注日、中雙方未來在「一帶一路」等項目中的互動，特別是在協力廠商合作之案例細節與實務安排，為臺商尋求參與「一帶一路」的契機。誠如夏威夷大學馬諾分校（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亞洲研究專家葛維拉（Kristi Govella）所言，大多數國家不願遭人宰制，無論它是美國、中國大陸亦或是日本，尤其是小國，總希望兩邊下注，有不同的選擇，不受制於任何特定大國。避險（Hedge）應為我國因應日中關係升溫之選項，在美、中博弈中，審時度勢，靈活應對，尋求「九二共識」的解方，突破兩岸關係困局，以期在變局中立於不敗，有效維持兩岸現狀。